

刘兵,郑志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与发展[J].体育学研究,2023,37(5):1-10.

编者按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性、人民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指向和内涵引领。建国以来,我国体育社会组织从无到有,组织治理从路径依赖到创新发展,体育社会资源从需求不足到供需平衡,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的探索之路和自我调适极大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体育发展内容。该文探讨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背景下,我国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的内涵和诉求,提出了当前我国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与发展面临的内部与外部矛盾。内部方面,组织价值如何从工具到理性、组织机构如何从脱钩到重构、组织结构如何从虚脱到实体、组织绩效如何从模糊到清晰;外部方面,如何构建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的网络资源、治理主体如何从主体协同到一核多元、组织面向如何从向上发展到向下发展等多维视角。这为我国体育社会组织治理提供了研讨基础和发展指向,为后续进一步深化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我国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思路。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与发展

刘兵^{1,2},郑志强³

(1.上海大学体育学院,上海 200444; 2.上海大学体育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444; 3.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山西太原 030031)

【摘要】:近10年来,我国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发展加快。研究采用文献资料、逻辑归纳、实地访谈以及案例分析等方法,对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发展的挑战性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得出: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是结构形态和运作模式的转变,具有中国性、人民性、复杂性等特征,表现为内部转型和外部转型两种形式。现阶段,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的内部挑战为组织价值模糊、民主性不足、专业服务水平低;外部挑战为组织公信力不足、资源瓶颈约束、社会治理参与有限。面对挑战,体育社会组织应确立新发展理念、内强人才队伍体系、提升体育社会组织专业服务能力;外强资源汲取,增强社会治理网络关系,借助制度优势,构建体育社会组织治理共同体;善用数字技术,释放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发展的新动能;积极“走出去”,提升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的国际化水平。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群众体育;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数字赋能

【中图分类号】:G8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656(2023)05-0001-10

DOI: 10.15877/j.cnki.nsic.20231020.001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用“社会治理”代替“社会管理”^[1],将社会治理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目标结合起来,推动以政府为中心的科层治理向多元合作的协同治理转型,为治理体制转型提供了新方向。党的十九大强调,“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

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2]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夯实国家和社会稳定基层基础,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主动适应社会治理的阶段特征,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

收稿日期:2023-08-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2BTY069)。

第一作者:刘兵(1969—),男,安徽亳州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体育社会组织管理。

总体要求。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体育社会组织发展历经从无到有、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分类别、分层次推进,实现体育治理的组织化发展。体育社会组织发展脉络、演进趋势与治理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3],并紧密嵌入我国社会治理的转型进程^[4]。

2012—2017年,我国法人登记体育社会组织规模从2.3万个增长至4.8万多个,年均增幅超过10%,远高于同期全国社会组织约4%的增长点;2018年已增至6万左右^[5];2020年体育社会组织总数达到60 176个^[6](图1)。现阶段,各类基层体育自发组织发展异常活跃,大批草根体育组织、农村体育新乡贤等均成为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新特点和新途径。当前,学界主要基于“国家—社会”二分法的思维方

式,用“法团主义”“分类治理”“多元治理”视角探索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之路^[7],或从“制度主义”方式分析制度环境的影响^[8],分析“分类控制”“优先发展”对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的推动作用。上述研究主要从传统的“国家—社会”关系视角解读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之路,研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略显不足。面对社会制度环境变革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传统的“政社关系”已经不能完全解读体育社会组织治理发展的新问题。如何理解当代中国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发展的新特征、如何研判体育社会组织成长面临的深层挑战,以及体育社会组织自身发展如何做到顺势而为,适应新时代中国体育治理现代化转型的现实要求,已成为当前体育社会组织治理领域的核心理论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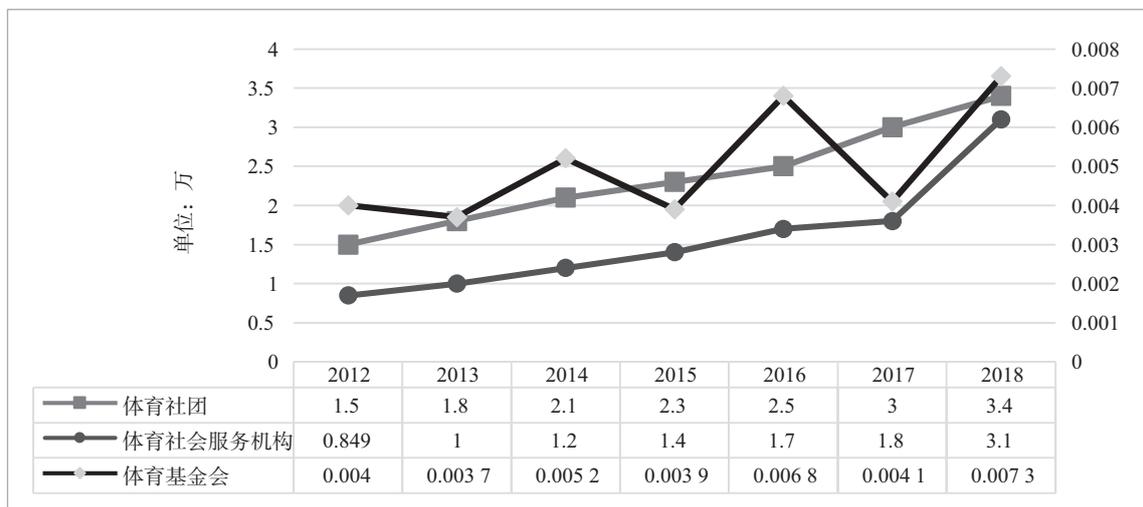


图1 三类法人体育社会组织治理发展趋势图

Fig.1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ree types of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注:资料来源于中国社会组织网,由笔者根据其公布的历年数据整理所得

1 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的内涵与维度

1.1 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内涵

转型是指“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发生转变”。转型是社会变迁或社会发展战略的变革,是从原有的发展轨道进入新的发展轨道。托马斯·库恩^[9]认为,转型是事物发展“范式”的转变,由旧的系统转向新的系统,涉及事物形态的发展结构、运转机理的变革。近年来,“转型”一词在体育学界频繁出现,如“体育发展理念转型”“体育发展方式转型”“体育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等,成为指证人们认知升级和体育改革的专属词汇。具体到体育社会组织治理发展领域,“国际体育组织变

革”“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脱钩改革”“体育社会组织治理实体化”等均是体育发展转型的具体表现。

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强调由一种结构形态、运转模式转变成另一种结构形态、运转模式,转型主体状态及其与所处环境的适应程度决定着转型的内容和方向^[10]。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包括内部转型和外部转型两种形式。如目前学界所讨论的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能力等都属于内部转型范畴,是体育社会组织治理内部的自我革新;外部环境是导致组织转型的重要因变量。随着开放系统的权变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的兴起,对组织的研究也呈现出由封闭到开放、由结构到过程、由静态到

动态的转变。如受执政党和政府公共权威掌舵所推动,以及市场竞争、社会压力等形势所迫,体育社会组织治理所采取的依附式自主、资源性适应等变通性策略,是体育社会组织治理适应外部环境的具体表现。

1.2 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维度

1.2.1 内部转型

内部转型主要是组织主体基于特定目标达成或利益追求驱动,以主动求新求变方式进行自我系统性转变。组织内部是一种理性和技术一体化的结构系统,组织文化、内部治理、人才要素是组织内部转型的3个关键要素^[11]。①组织文化再造。完成与政府脱钩后,体育社会组织治理应回归价值理性,确立“以体为主”的组织价值观,坚守“体育公益”的社会使命,致力于改善社会公众健康和福祉的组织愿景。加强体育社会组织治理内部文化建设,完善内部章程、规则、条例,追求卓越、平等、团结。培育志愿精神,追求公平正义,提升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的善治水平。②完善内部治理。政社脱钩后,体育社会组织治理不能完全以“行政化”标签一概而论之,要借鉴现代企业化法人治理,按照“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主的现代社会组织治理体制”,建立健全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机构,明确会员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的职责,确立决策、执行和监督三者制衡机制^[12]。重点落实理事会和监事会职能,完善组织激励机制与自律机制建设;列明职能权力清单,规范权力责任体系;完善秘书处职能,如人事部、财务部、市场部、外联部等机构职能建设,以及理事会相关委员会的制度建设,如治理委员会、运动员委员会、教练员委员会、裁判员委员会等,吸纳行业专家担任顾问,提升组织内部专业化治理水平。③人才要素聚合。除了上述价值文化和规范流程,体育社会组织变革还需要对从业者的职业、角色、身份、技能、贡献等进行定义。增加组织治理结构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聚合社会各界人才资源要素,吸纳会员、理事、社工、志愿者、环保者等加入;依据章程自主选人用人,规范各类人才薪资发放,激发组织内部治理活力,最终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发展。

1.2.2 外部转型

第一,政府资源牵引体育社会组织治理服务战

略转型。我国政府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充分考虑社会公众的体育愿望和诉求,满足社会公众对高质量体育服务享受和发展的需要。随着政府补贴、税收减免、场地支持等不断加大,在政府体育资源服务绩效导向下,体育社会组织治理开始实施资源战略管理,不再“跟着项目跑”,遇到项目就“海投”,而是做好资源筹集和公益营销,将工作重心转向服务社会公众,推动组织资源向基层下沉,扎根社区公众的体育服务需求,引导社会公众参与体育服务决策讨论,确保体育服务输出更为标准化和精细化,达成政府、社会公众与体育社会组织之间体育治理的集体行动。

第二,商业模式促进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的自律转型。作为政府与市场中间的组织形式,商业化运行是体育社会组织治理主动适应市场机制的模式变革与创新,以不变应万变,随时能够应变市场的变化。优化体育市场服务品牌设计,通过市场营销、电视转播等方式,推动组织服务链向市场延伸,理解顾客消费偏好,创新体育服务产品的价值链管理。吸引赞助商和广告商的商业赞助。但作为非营利组织,必须加强组织自律机制,维护企业捐赠者利益,坚持体育公益价值取向,将商业捐赠用于体育公益事业。

第三,数字化激发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的新业态。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以及云计算等技术不断发展,催生体育社会组织治理发展的新产业和新业态。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创新技术被广泛应用到体育社会组织治理内部,被组织管理层、员工、服务受众所掌握。数字化为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带来一场颠覆性革命,数字化改变体育社会组织治理旧的思维模式、旧的治理结构、旧的标准范式,应用新技术确立新的思路、建设新的结构、形态和模式。数字化赋能让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结构、服务模式、运营方向等发生深刻变革,帮助组织重塑竞争优势、提升社会价值,达成新的企业形态。

2 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的特征与方向

2.1 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的特征

2.1.1 中国性

中国体育社会组织治理既具有与域外社会组织相似的特征,更具有其独特的中国性,这种鲜明的

“中国性”难以简单地以域外理论进行解释^[13]。不同于西方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自下而上的生成路径,以及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抗策略,中国体育社会组织治理采取依附式独立、依附式自主发展策略,始终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完成与政府脱钩后,体育社会组织成为依法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体,自主性与合法性不断增加,但体育社会组织与政府仍然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在创新社会治理背景下,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遵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路径,形成党委、政府、社会公众、体育社会组织“一核多元”的治理共同体。

2.1.2 人民性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性”是体育社会组织治理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属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新时代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人民群众是体育治理现代化的原动力,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发展贯彻“人民性”,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亲民、惠民、便民的体育服务,实现体育服务供给由“补缺”的“有没有”向“共赢”的“好不好”发展。不断输出高质量体育服务产品,有效化解体育领域应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战略选择^[15]。体育社会组织不再高高在上,而是推动治理结构和资源下沉,这种“向下治理”主要面向基层社区、广大乡镇及农村地区,走群众路线,抓住群众体育服务的核心要素与流程,想群众之所想、服群众之所需。治理流程转变把组织服务和群众需求融合,打造新型的服务型体育组织,这是一种根本性转型。

2.1.3 复杂性

受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力量的影响,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极具复杂性。政府的扶持和培育是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受政府控制影响,体育社会组织自主性和发展活力受到限制。一方面,体育社会组织既要独立于政府,为民众提供专业化的公共体育服务;另一方面,体育社会组织与政府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政府资源和政策有着较大依赖。市场环境的日益变化给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创造机会,在注重公平、效益、合作的市场机制下,体育社会组织治理应学习企业治理之道,如获得企业赞助、社会捐赠,提升自身开展社

会公益和慈善的必要资源;同时,避免“企业化”和“营利化”倾向,失去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的服务功能和人民性特征。社会各界力量的参与使得体育社会组织治理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需求差异化,体育治理主体利益的不断分化,以及各种利益矛盾冲突均会导致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的复杂性。

2.2 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的方向

2.2.1 社会化

社会化是体育社会组织治理改革的基本原则。2008—2012年,城市社区空间出现大量社会性服务机构,社区体育组织逐渐进入城市社区治理视野。自2015年《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实施后,上海、江苏、浙江、青海等多个省份开启改革,以社会化、规范化、法治化、信息化、专业化来推动体育社会组织法人治理建设,极大推进了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社会化转型的进程。以上海为例,2018年,上海市政府推动体育社会组织治理“四有”改革,即“有直属办事机构”“有专职工作人员”“有办公场所”“有活动经费”;2017—2020年,上海市体育社会组织共获得2 485万元的政府购买服务专项资金,上海市3A级以上体育社会组织举办赛事共1 358次,国际赛事280次、全国赛事385次。上海市体育社会组织年检合格率提升85%^[14],上海市体育社会组织活力指数位居全国前列。

2.2.2 市场化

市场在体育治理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市场机制能让体育社会组织之间公平公正参与竞争,通过相互博弈、沟通、协调,建立体育治理主体之间的服务责任和信任规范。在基层体育治理中,由政府服务采购、财政补贴、项目资助、税收减免等方式支持体育社会组织治理发展,向体育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以及对其提供的服务进行监管。体育社会组织自主适应市场参数的动态变化,主动了解政府和社会公众的体育需求,借鉴市场主体以PPP模式参与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推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创新性^[15]。体育社会组织内部治理借鉴现代企业法人精神,按照市场化原则逐步去行政化,坚持会员主体资源结社,完善内部法人治理,充分发挥会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机构作用,加强秘书处制度化建设。确立战略规划、治理标准、技术规范、服务承诺等自律体系,发挥组织自律、服务、协调等功能,不断提升组织

自治水平。

2.2.3 国际化

体育社会组织治理外事工作具有民间性、跨国性、非政府性、全球性等特征。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倡议的施行,向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走出去”提供新形式并提出新要求。“走出去”是体育社会组织治理“国际化”的渐进过程,加强体育交流的民心相通,深入各国民间对体育的相互理解,促进不同体育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互学互鉴。虚心向世界各国体育学习,对接国际体育治理标准、达成体育治理共识。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体育现代化发展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讲好中国体育故事,展示中国体育形象,助力世界体育共同体建设。

3 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的具体表现

3.1 内部转型的表现

3.1.1 组织价值从工具化到理性化

工具理性指组织治理的具体结构、治理功能和技术路线。企业依靠竞争获取更多的利润,才能立足于不败之地,利润追求是企业的显性标志;作为非营利组织,体育社会组织可以参与体育经营获取利润,但体育社会组织的一切资源,无论是志愿者捐献的劳动时间、劳动能力,还是所捐的钱物,必须按照非营利性坚守公益和慈善。按照萨拉蒙对非营利组织的界定,体育社会组织是一个正式的法人组织,除了要建立组织章程、治理结构、一整套管理制度和正式的工作人员之外,最为关键的一点是,要确立组织的总方向和总目标,如组织愿景、组织价值、组织目标,坚持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的价值理性,做“对的组织”和“对的事”。

3.1.2 组织机构从脱钩到重构

体育社会组织与国家行政部门脱钩前,体育社会组织带有“半官半民”性质,内部治理为“一个班子,两块牌子”的管理模式;脱钩后,体育社会组织治理逐步实施去行政化改革,打破同构制度,建立现代社会组织法人制度,坚持培育扶持与监督管理并重的原则,完善体育社会组织内部法人运行制度,通过建章立制,突出以章程为核心的内部治理,完善会员大会、理事会、秘书处等内部法人治理结构,推动内部治理专业化、职业化和规范化建设,提升组织自治水平,激发组织治理活力。党建是体育社会组

织机构重建的重要工作。以中国足协协会(以下简称“中国足协”)法人制度改革为例,2015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把加强党建作为足协实体化改革的重要内容”;2016年,中国足协启动党委和纪委组建工作以来,在协会内部专门成立“党务宣传部”“党务人事部”“纪检监察部”等机构。目前,中国足协党委共下设9个党支部。这些机构和部门都设立专门的党务、纪检岗位,并配备相关工作人员,协助协会党委、纪委做好党务和纪检工作,将开放式党建治理“嵌入”协会法人治理结构中,实现党组织与协会法人治理多元主体互动。尽管后续治理过程中出现种种问题,但组织重构的本身和发展道路并没有错。党组织嵌入协会法人治理结构,实现与协会理事会、秘书处、协会主席等多元主体进行互动,在与各主体的良性互动过程中,实现党组织职能与协会内部治理主体职能融合,将党组织的组织优势和政治优势与体育协会法人治理优势结合起来,构建党组织与法人治理结构多元主体互动的结构体系。

3.1.3 组织结构从虚脱到实体

第一,建章立制,完善内部章程治理。章程是体育社会组织内部治理中的“小宪法”^[16]。一方面,章程设计需要从人事、财务、业务、党建等各领域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特别体现党管干部、党委监督的原则,明确决策层、管理层、监督层及党组织的主要职责权限,持续推进体育协会治理结构的制度化和章程化发展;另一方面,章程的完善要结合行业、市场、社会治理实际情况,突出本行业治理特色,以数字化、信息化、法治化思路明确章程诚实无欺的职业共识,尤其是在面向市场治理中,体育协会的章程必须将俱乐部的合意加以规范性转化,为后续协会实施市场行为管辖和裁判纠纷提供证据。

第二,重塑部门职权边界,明确治理主体权责关系。参照非营利社团法人治理结构标准范式,优化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实现由繁到简、由虚到实的转变。将以往复杂的各层级治理结构精简为“会员大会—执委会—秘书处”三个层级^[17]。明确理事会作为决策层的职责权限。理事会的决策职能至少应包括:战略决策、战略监督与关系协调等。管理层推行主席或理事长负责制,对组织日常业务、财务资产、人事等管理工作,按照“企业化”治理模式,逐步

实施去行政化,区别于传统多层次、集权化的内部封闭管理模式,推行目标分权的扁平化结构模式,双重赋权和章程修订孕育的内生动力驱动制度体系更加完备。

3.1.4 组织绩效由模糊到精准

作为全民健身服务产品供给主体,体育社会组织对上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对下向社会公众提供专业体育服务,因此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绩效精细化日益凸显。

①化繁为简,专注细节。简化繁琐的资源结构和服务流程,明确社区居委会、社区党委职能,优化社区体育场地开放时间和改造流程,为体育社会组织治理服务提供便利。②科学决策,循序渐进。基于问题导向,建立识别、评估与转化的治理流程,将群众体育问题上升为组织决策,再将组织决策转换为优质服务产品,通过科学、理性的决策,输出更高效的体育服务产品,让体育组织服务输出的产品内容、效应与群众满意度匹配。③网格化管理,精准对接服务需求。完善内部网格化管理模式,探索“热线+网格”为民体育服务模式,借助数字手段完善收集、分类、派单,及时掌握周边居民健身需求,做到精准对接、上门服务,对服务过程实施动态更新与动态监测,注重居民的服务感知、服务评价和服务反馈,真正做到体育社会组织治理服务的精细化。

3.2 外部转型的具体表现

3.2.1 发展思路从追求速度到追求质量

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体育社会组织从追求数量到注重质量,从追求速度到提升效益。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的“社会属性”回归,践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体育服务。政府加大体育社会组织评估和监管力度,从年度表彰、等级评优、优质案例、政务宣传、购买服务等方面入手,尽快培育一批典型组织案例,充分发挥案例型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经验的推广和辐射。加快与市场接轨,引入竞争机制,优胜劣汰,清除非法组织和僵尸型组织,努力提升“专业做事”的治理能力。

3.2.2 资源网络获取从消极被动转向积极主动

针对体育社会组织治理发展活力不足的问题,资源获取要变被动为主动,转变“等靠要”的消极思维,强化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资源网络,提高体育社会组织吸引能力,主动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配合政

府的年检和评估工作,建立良好的政社合作关系。引入商业化运作模式,注重组织服务营销,提升组织发展热度,依托组织公信力合理接受企业的商业赞助。坚持跳出体育圈子,强化组织内部激励机制,调动成员参与社区体育治理的积极性,吸引社会资本加入,广泛接受社会捐赠,增强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的发展活力。

3.2.3 治理主体多元协同到一核多元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历次中央政策明文规定社会治理有效性的前提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体系^[18]。但由于多元主体各自权责界定不清晰,体育政策不够细化,导致在社会体育治理实践中出现多元主体掣肘、相互推诿的现象^[19]。“一核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方式,可以实现党建统筹、政府执行、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共同体。确立党组织在多元主体的核心位置,党组织是体育治理的导航者,发挥好党建引领作用,确保多元治理主体实现良性互动。政府居于中轴地位,体育部门官员要转变管理思维,重塑自身角色,政府并非管理者、控制者和资源垄断者,而是体育治理的参与者、协调者、监督者、服务者和资源分配者。社会公众是体育治理的直接参与者,体育服务质量好不好、体育服务态度满不满意,社会公众最有发言权。随着社会公众体育参与和体育维权意识的提升,加快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体育治理共同体。

3.2.4 组织面向从向上发展转为向下发展

“向下治理”等理念符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向下治理”要求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走群众路线,夯实体育治理的实践根基。扭转体育社会组织治理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发展态势。切实回应人民群众“健身难、体育设施包容性差”等突出问题,做到人民群众“健身去哪儿,体育社会组织就在哪”。将组织服务全民健身路径重心下移到社区和基层,向社区、基层、街道、家庭辐射,建立以社区为中心的体育服务平台,更好地满足社区多元化、个性化的体育服务需求。推动体育三下乡、体育走基层活动常态化发展,打造“志愿体育服务驿站”“体育爱心桥”“老年体育中心”“体育创业孵化基地”等城乡便民体育服务中心,助力乡村

振兴建设。

4 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的挑战

4.1 内部挑战

4.1.1 体育社会组织治理价值模糊

公益性与非营利性是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的基本特性,但处于转型期的体育社会组织治理在经营理念、运作结构、思维模式等方面尚未稳定^[20]。体育社会组织治理成立的目标、使命和愿景不明确,体育社会组织的发起人、理事、会员、监事等对组织性质认知有所偏差,有的发起人将注册资金理解成对体育基金会的“借款”,有的理事长将组织的公益项目看作是自己的“创业项目”。尤其是一些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在实践中不能恪守公益性和非营利的初心,将企业的经营方式带入体育社会组织治理中,在利益驱使下背离体育服务的使命,走上“逐利”的道路。

4.1.2 体育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民主性不足

就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自身发展而言,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是其有序、有效参与社会治理与社会服务能力提升的基本前提。大多数组织在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的重大决策问题表决时,看似履行了民主程序,但理事会决策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体育社会组织内部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理事会制度缺失,理事会决策会议走过场,理事会治理“空壳化”“形式化”“业余化”现象严重,理事会职能和作用被弱化。

4.1.3 体育社会组织治理专业化服务水平低

体育社会组织治理服务意识淡薄,体育资源整合能力较差,活动场地、活动设施缺乏。体育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学历较低,工作人员多为退休人员,年龄相对偏大,思维相对保守,工作效率不高。组织人员专业化服务水平低,兼职人员居多,教练员、社会体育指导员、体育志愿者“无证上岗”情况多。体育社会组织治理服务产品的内容、标准、质量缺失,服务绩效评价指标、考核机制透明度不够^[21],体育社会组织过度依赖政府资源致使其主体附庸化、服务低效化、发展异化^[22]。体育服务活动与社区结合不紧密,体育服务供给总量不足、低效供给与低质供给严重,供给输出与供给需求错位,供需动态变化诱使供给机制脱节^[23],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

服务的期望。

4.2 外部挑战

4.2.1 体育社会组织治理公信力不足

现阶段,我国体育社会组织发展良莠不齐,依托政府管理的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相对较好,大量民间体育社会组织合法性欠缺,“三无”(无人、无钱、无资源)体育社会组织数量较多。研究表明,2015年,95%的体育社会组织没有“正式身份”^[24],尽管近些年来有所好转,但仍有部分体育社会组织存在违法经营、违法募捐问题,尤其是某些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存在“乱收费”“高收费”等违法经营现象,“欺行霸市”“打压同行”等现象屡见不鲜,严重损害了体育社会组织的社会形象。

4.2.2 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的资源瓶颈

作为非营利组织,体育社会组织对外部资源的依赖不可避免,提高组织的吸收能力,建立强大的网络资源关系是解决资源瓶颈的必由之路。现阶段,我国90%以上体育社会组织市场活力不足,社会组织自我造血功能不足,大多数体育社会组织靠向政府“化缘”来维持生存。政府主导的体育社会组织靠扶持、体育协会靠会费、民间非营利体育社会组织靠服务,其他体育社会组织普遍陷入资金困境^[25]。由于动员和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有限,很难获得社会捐赠、企业投资和商业赞助,大多数体育社会组织面临着“有增长无发展”的困境。

4.2.3 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不足

受资源、经费、人力等多方因素的限制,我国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较弱。体育社会组织的自愿性和公益性失灵,在参与社会治理中存在谋利倾向,首先考虑的是经济效益,公益性反而弱化。体育社会组织内部志愿者和体育社工兼职人员居多,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结构和资源向基层下沉力度不够,参与社会环保、慈善、救济、扶贫等领域的深度和广度不足。

5 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发展策略

5.1 内部策略

5.1.1 确立以愿景、使命和价值观为引领的发展理念

作为非营利性组织,体育社会组织治理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愿景、使命和价值观为魂,

发起人、理事会、管理层、捐赠者、志愿者等成员拥有共同的意愿和使命,在体育社会组织的日常运作中,将价值、使命和愿景融入组织决策、组织规划、组织战略中,有效引导组织成员积极践行。确立“以体为主”“以体育人”的组织宗旨,追求卓越、自信、公平、正义的组织价值观,致力于以体育公益和体育慈善事业发展为目标,通过慈善基金、慈善拍卖、慈善捐赠、慈善义赛等方式向社会各界筹集资金,提高慈善价值担当,扎实推进体育社会组织全民健身公益品牌建设。

5.1.2 夯实体育社会组织治理人才队伍体系

广纳社会各界人才,落实专业人干专业事的发展理念。吸纳优秀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社会体育指导员在体育社会组织治理中任职,确保组织成员持证上岗。涉及体育社会组织财务、法律、审计、营销等专业性较强的业务,需要相应的专业人才为组织专业化发展保驾护航。结合“体医融合”“体卫融合”“体旅融合”“体教融合”等新业态,开展技能指导、运动处方、运动康复、运动疗养、体育旅游等专业服务。及时掌握政府购买体育服务政策,以及体育法律法规政策,研制体育行业培训和服务标准。定期开展体育行业分类培训,加强体育人才队伍的行业服务价值观引导。

5.1.3 提升体育社会组织治理专业服务能力

现阶段,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黄金期”已经到来。2022年,《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全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2.6 m^2 以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县(市、区)、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三级15 min健身圈实现全覆盖,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2.16名,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5万亿元^[25]。国家全民健身服务战略工作重心下移,各地政府加大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力度,作为全民健身发展的中坚力量,体育社会组织要发挥好桥梁作用,强化专业服务能力的提升,对上治理主动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向下治理引导公众参与,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全民健身的活力,真正做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发展。尤其是向下治理遵循体育治理的底层逻辑,将组织结构和资源向社区、基层、乡镇、农村下移,走群众路线,回归公益和慈善价值,提升社会公众对体育公共服务的满意度。

5.2 外部转型策略

5.2.1 加强资源汲取,增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能力

加强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的学习能力,依托自身的能力效应,构建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资源网络;减少政府干预,通过协调市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按照市场规律优化组织资源配置,确保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资源配置的精细化。建立以多元渠道促融合,创设“体育公益创投”项目品牌,实现体育资源平台统筹整合,考虑体育募捐筹款和体育公益项目众筹,创设公益捐赠平台,接受体育器械、体育服装、体育用品捐赠,优化捐赠经费和捐赠实物的结构配比。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党组织对接基层治理的凝心聚力、对接沟通等职能,积极推动体育社会组织深入参与社区治理,真正做到体育社会组织公益产品与公益项目的成果分享^[26]。

5.2.2 借助制度优势,构建体育社会组织治理共同体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制度建设是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构建“一核多元”“众星捧月”的体育治理格局,党委、政府、社会公众、体育社会组织均是体育治理主体,基于互动协商、权责对等的原则,回应并解决体育治理的现实问题。

首先,党建是体育社会组织治理法人制度改革的重要制度性安排。从组织治理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分析,党建引领可以有效突破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结构内卷化、碎片化、参与不均衡、激励不足等制度困境。①构建党组织与法人治理结构多元主体互动的结构体系(图2)。将开放式党建治理“嵌入”组织法人治理结构中,实现党组织与体育社会组织法人治理多元主体互动。党组织与理事会、秘书处等机构融合,实现党组织职能与组织内部主体职能相融合,将党组织的组织优势和政治优势转化为体育组织社会的治理优势。②党组织与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结构融合的共存性特征。让党建制度与法人治理制度共生于体育社会组织治理内部。明确党组织在体育社会组织法人治理各环节的权责和工作方式,推进体育组织党建工作的力度和深度。通过建立“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制度,强化党组织和体育组织成员的

沟通交流机制,推动双方成员的一体化发展,促进组织的健康与可持续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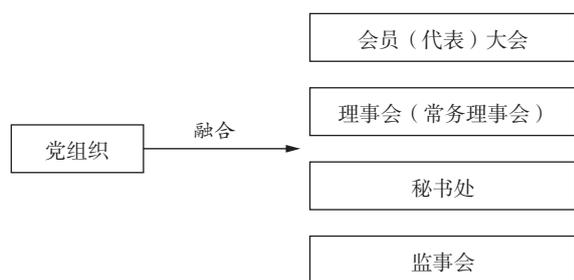


图2 党组织融入体育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Party organizations integrating into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其次,党组织在多元主体合作共治过程中具有动员和协调参与的作用。现实中,因承接地方政府诸多行政任务,使得体育社会组织治理任务“内卷化”,自治功能被异化。党建引领帮助体育社会组织治理摆脱对政府资源的路径依赖,充分衔接多方共治,将资源“碎片化”、服务“悬浮化”、组织“分散化”的治理变成“多方联动共同体”。党建引领并不是“统合”“管控”“包办”,而是“激活”体育社会组织的“多方共治”,以政府购买体育服务、体育公益创投、体育志愿服务等形式,使体育社会组织自治、社会体育搭建平台、体育社工提供服务联动起来,推动各类体育社会组织承担更多个性化、多样化、差异化的社区服务功能。

最后,党建引领倡导群众路线,以服务人民群众为中心,倡导提供优质体育公共服务,实现组织治理价值。学理上,党建引领的体育治理群众路线丰富了“人民至上”“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理论话语。通过体育社会组织治理下层,把“人人”组织起来,横向和纵向层面实现社会公众与体育社会组织的紧密联系,形成多层次、多形式的社会自我治理。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目标落实到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过程之中,真正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发展宗旨。切实推进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体育治理的决策制定、过程监督和治理绩效评价,共享体育治理成果。

5.2.3 善用数字技术,释放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发展新动能

数字技术已成为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发展的助推器。具体表现为:①数字技术重塑体育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体系。体育社会组织传统治理重视

机密性、等级制,组织透明度、可信度和合法性不足。数字化可以打破体育社会组织内部壁垒,对其内部权力、治理边界进行重塑,依托数字化增强体育社会组织治理透明度,实现信息对称,增加组织内部治理的灵活性和交互性特征。②数字化助力体育社会组织服务治理精细化。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治理的智能化、精细化特征,宣传组织服务理念、帮助组织筹集资金,吸纳资源,提升组织的财务绩效。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传感器等技术在组织服务各环节的渗透,收集社会公众对体育服务的满意度数据,提升体育社会组织治理公益绩效的可测性。③数字化提升体育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治理能力。在全民健身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多省市构建了体育组织的数字化平台。2021年,浙江省创建了体育社会组织全民健身服务数字2.0平台,如宁波的“智慧场馆健身码”、湖州的“运动码”、嘉兴的“运动家”智慧社区。通过数字化、智慧化的改造,将“运动机器人”“可穿戴设备”“健身APP”等运用于体育组织服务实践,如场地预定、健身指导、训练管理等,用户可以进行智能查询和数据交互,实现体育社会组织治理公共服务能力的优化和升级。

5.2.4 积极“走出去”,提升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的国际化水平

近些年,我国体育社会组织“走出去”成绩斐然,在人道救援、发展援助、环境保护等领域愈加活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境内活动管理办法》和《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境内开展体育活动管理办法》,确立“民心相通,公益先行”发展目标,坚持“走出去引进来”相结合原则,聚合官方、企业、民间三方力量,借助东盟、上合、金砖等外交平台,向周边国家开展体育援助、人道主义,实现中国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平等与共赢。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开展与西方国家体育社会组织的交流合作,了解西方国家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的工作经验。对接国际体育组织的治理规范、治理标准、治理结构、治理机制。以会员身份、服务输出等方面寻求与国际体育机构合作。参与国际体育规则的制定、解释、修改等,提升体育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的国际化水准。积极关注国际体育扶贫项目,结合组织自身特征,申报国际体育组织的各类公益项目。重视体育社会组织优质案例的辐射和推广,尤其对体育慈善、体育扶

贫、体育救济等优质案例,加大推广力度,为全球体育治理提供中国经验。

6 结语

就国际视角而言,评价一个国家群众体育发展水平,首先,建立在这个国家有多少数量的体育社会组织,如果没有庞大数量的体育社会组织,群众体育发展是难以想象的;其次,高质量的体育社会组织治理往往又与组织的专业性人才及其资源投入紧密相连,高素质和标准化是其明显特征;最后,体育社会组织成为社会信赖的纽带,根植于社会关系的细胞之中,依托的是体育社会组织治理“以人为本”的愿景和价值观,这才是体育社会组织治理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力量。

参考文献:

- [1] 郁建兴,任杰.社会治理共同体及其实现机制[J].政治学研究,2020(1): 45-56,125-126.
- [2] 郁建兴.社会治理共同体及其建设路径[J].公共管理评论,2019,1(3): 59-65.
- [3] 裴立新.新时代中国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9(3): 17-22.
- [4] 高跃,王家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范式转换的进路和特征——一个基于社会控制理论的分析框架[J].中国体育科技,2021,57(5): 86-91.
- [5] 崔月琴,袁泉.转型期社会组织的价值诉求与迷思[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 117-125.
- [6] 杨桦.体育改革:成就、问题与突破[J].体育科学,2019,39(1): 5-11.
- [7] 康晓光,韩恒.行政吸纳社会——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再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7(2): 116-128.
- [8] 任海.中国体育治理逻辑的转型与创新[J].体育科学,2020,40(7): 3-13.
- [9]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10] 郑志强,任柏超,曹景川,等.《民法典》时代体育协会法人治理的现实困境与疏解策略[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2,37(1): 74-79.
- [11] DIMAGGIO P J.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 field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0, 48(2): 147-160.
- [12] 郑志强.西方体育组织治理理论研究述评——基于董事会战略决策功能构建视角[J].体育科学,2016,36(4): 77-83.
- [13] 高奎亭,陈家起,李乐虎,等.我国体育社会组织复杂适应性治理研究[J].体育学研究,2020,34(6): 69-78.
- [14] 国家体育总局.上海市体育总会探索体育社会组织治理新模式[EB/OL].[2020-12-04].<https://www.sport.gov.cn/n14471/n14480/n14517/c971932/content.html>.
- [15] 冯侯睿,郑家颢.数字技术助推社区体育精细化治理:内涵、机制和路径[J].体育学研究,2023,37(2): 85-95.
- [16] 黄亚玲.我国单项体育协会改革的软法之治[J].体育科学,2020,40(2): 15-23.
- [17] HOYE R, AULD C.Measuring board performance in non-profit sporting organizations[J].Journal of Volunteering,2017(6): 6-16.
- [18] FERKINS L, SHILBURY D, MCDONALD G.The role of the board in building strategic capability: Towards an integrated model of sports governance[J].Sport Management Review, 2018(8): 195-226.
- [19] 刘国永,戴健.中国群众体育发展报告(2016)[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 [20] 戴健,史小强,程华.“十四五”时期我国全民健身发展的环境变化与战略转型[J].体育学研究,2022,36(5): 1-8.
- [21] 季彦霞,吕万刚,沈克印,等.元治理视角下体育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现实困境与改革路径[J].体育学研究,2021,35(4): 52-58.
- [22] 李晓栋,颜秀真,刘紫薇.嵌入式治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体育治理的模式研究——基于S省T市两个社会组织的实证分析[J].体育学研究,2021,35(2): 83-91.
- [23] 李燕领,代争光,张凡涛.精细化治理视角下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如何有效提升居民获得感?——基于多案例的比较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3,57(9): 12-20.
- [24] 尤传豹,高亮.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体育强国建设[J].体育学研究,2023,37(1): 2.
- [25] 范和生,唐惠敏.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路径拓展与治理创新[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6(2): 90-97.
- [26]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2-03-24(001).

作者贡献声明:

刘兵:论文框架设计,讨论、撰写论文;郑志强:资料收集,撰写论文。

(下转第19页)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The Transformation, Causes and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of Wushu Aesthetic Culture

MA Wenyu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2, China)

Abstract: Deconstructing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Wushu aesthetic culture and its causes has important enlightening effe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Wushu and even 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Wushu culture.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causes of Wushu aesthetic culture. It is found that the traditional aesthetic culture formed by Wushu in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s in aspects such as “changes in aesthetic taste, reconstruction of aesthetic value, and transformation of aesthetic methods” in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The cause of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Wushu aesthetic culture is due to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era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ideology, politics, economy, and technology”. It is therefore suggested that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Wushu aesthetic culture is a dynamic process of change and a manifestation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Wushu should not be stubborn in traditional concepts, but adept at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nd build a harmonious and symbiotic development model. This means showcasing the essence of Wushu beauty through artistic forms of expression, and utilizing the advantages of visual culture to sprea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combat ideas of Wushu, in order to construct a good Wushu cultural ecology.

Key words: Wushu; aesthetic culture transformation; visual culture; aesthetic taste; aesthetic value; aesthetic style

(上接第 10 页)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 Governance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LIU Bing^{1,2}, ZHENG Zhiqiang³

(1. Phys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2. Physical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3.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31,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ten year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 have accelerated. The research adopt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logical induction, field interviews and cases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the challenging factors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of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old structure form and operation mode into the new,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style, people and complexi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 includes two forms: internal transformation and external transformation.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 internal challenge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are fuzzy organizational value, insufficient democracy and low professional service level. External challenges include lack of organizational credibility, resource bottleneck constraints, and limited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face of challenges,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should internally establish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strengthen the talent team system, and enhance the professional service ability of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externally boost resources access, strengthen social governance network relations, and build a governance community of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with the help of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Besides, it is also suggested to make good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to release the new momentum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actively “go out” to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level of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mass sports;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digital empowerment